

淮陰英烈

第 二 輯

(总第十五辑)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淮 阴 英 烈

第 二 辑

(总第十五辑)

中共淮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江上青(1911—1939)		(5)
朱启哲(1919—1940)		张鸿志(10)
陈 飞(1914—1940)		(17)
王道明(1907—1940)		(22)
陈少南(1921—1940)		(27)
叶可泽(1915—1940)		(31)
孙秉惠(1901—1940)		(35)
周 璧(1916—1940)		(39)
大胡庄战斗烈士		(45)
刘治国(1916—1941)		胡炳云(48)
鲍子和(1894—1941)		(52)
刘永安(1911—1941)		(58)
朱洪滨(1920—1941)		(62)
朱烈士洪滨碑记		涟水县委、县府敬立(64)
殷如杭和潘景澜(1916—1941)(1917—1941)		(68)
周道锡(1914—1941)		(71)
晏盛明(1913—1942)		(74)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81)
淮阴八十二烈士墓碑记		李一氓(84)
李云鹏(1920—1943)		(88)

王嘉树(1920—1943)	(94)
淮安县泾口区王大队长嘉树碑文	(96)
马 骥(1919—1943)	(100)
宋耀南(1913—1943)	(107)
刘逸奇(1902—1943)	(114)
臧 庚(1913—1943)	(119)
陆亚东(1915—1944)	(124)
许午阳(1918—1945)	(130)
郭光裕(1923—1945)	(135)
张胜武(1917—1945)	(139)

附1944年和1945年《淮海报》所载英烈

悼赵增荣同志(1944)	任延芳	(141)
悼刘齐、倪有业二同志(1944)	陶 励	(143)
悼崔维杰同志(1944)	王世琳	(145)
悼宋、范、吴三同志(1944)		(147)
悼民兵英雄一胡小四子(1944)	于铁民	(150)
追悼张振国同志(1944)	张魁仁 徐国华	(153)
被俘不屈光荣牺牲的赵存贞(1944)	· 良 ·	(154)
悼战斗英雄张洪凡同志(1945)	姚慎修	(160)

江 上 青

(1911—1939)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曾用名江蕃臣，1911年4月11日生于扬州。父亲江石溪工诗擅画，曾行中医多年，后在南通大达轮船公司当职员。江上青，先后在南通中学、扬州中学读书。他在南通中学阶段，开始接触革命，投入反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军阀的学生运动。1928年秘密加入共青团，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在扬州被捕，移押江苏高等法院苏州监狱。江上青坚不吐实，国民党当局无奈，判刑三个月后释放。同年秋，江上青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学习，后又转到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在此期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一次在虹口新亚酒楼参加党的秘密会议，被特务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江上青和难友们坚持斗争，要求在狱中干活，以便从狭窄的牢房内出来，扩大一点活动范围，结果斗争胜利了。敌人为了获得共产党的情况，对江上青滥施酷刑，并经常押着他“陪斩”，用以威吓。江上青被关押的两年中，备受折磨，体质虚弱，但始终坚强不屈。为了激励自己和难友，他曾

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诗集题名为《提篮曲》。有一首诗写道：“悠长的午夜都要走向黎明，地球底边象涌起了太阳。它弄来欢迎我们的渴望，有一天全世界受难的朋友，沐浴那温暖的阳光！……”

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摧残，出狱后，江上青患上严重的哮喘病和关节炎，回到扬州医治，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又曾一度被捕。获释后，先后在仪征扬子中学和扬州平民中学教国文，他利用课堂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不少学生在多年后还记得江老师讲课深切感人，富于革命的感染力。1936年，江上青与顾民元、于在春创办了《写作与阅读》周刊。周刊是辅导国文教学和帮助青年自学文艺等形式，通过评介国内外进步作品，反映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不少青年从中得到抗日思想的启蒙，深受读者欢迎，销路曾达好几千份。江上青自己也撰稿，如《黄梅时节》、《卢沟晓日》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七·七”事变后，陈素（德铭）从日本留学归来，一度在扬州中学教历史，江上青即与他创办《抗敌周刊》，后又与韩北屏、莫璞、王石城等合作，把《抗敌周刊》办得很有生气。江上青还和进步教师组织学生在平民中学内演出《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扬州沦陷前夕，江上青等组成江都文救会流动宣传团，溯江而上，沿途以演剧等形式宣传抗日，行至安徽六安，派人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

系。后在党组织的授意下，转往大别山地区，在六安、寿县、田家庵、颍上、固始、商城、浍水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时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曾登载章汉夫写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0月，盛子瑾出任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员公署（即皖东北地区）专员，兼第五游击司令部（简称“五游”）司令、第六抗敌保安司令部（简称“六抗”）司令。此人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主张抗日，且受到国民党桂系的排挤；但他野心勃勃，到处网罗人才，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安徽工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盛进行统战工作，由安徽工委负责人张劲夫通过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先后派江上青、吴云邨、赵敏、廖量之、周邨、石青等同志以抗日进步青年面目投入盛部，组成中共盛子瑾部队秘密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江上青任书记，任务是做开辟皖东北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盛子瑾委任江上青为专员公署秘书、“五游”、“六抗”政治部主任（吴云邨等同志都由盛子瑾委任了职务）。江上青等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利用盛子瑾主张抗日的一面，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同时秘密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到皖东北不久，江上青利用公开身份推动盛子瑾先后办了行政干部、青年干部、财经干部训练班，充实了地方基层干部力量。同时吸

收本地知识青年参加从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和大后方来的皖动八团、抗日剧团、抗演六队等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上述各类训练班都是我党党员编写教材并担任教员。江上青也亲自讲课，他善于就近譬喻，深入浅出，富于说服力和鼓动性。此外，还办了第五临时中学，有学生近千人，中共特支派党员谢景鸿到学校进行党的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活动，扩大党的影响。由于江上青等同志的艰苦努力，洪泽湖畔出现了新的局面，到处洋溢着抗日救亡的嘹亮歌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石印本也在这一地区发行。

为促使进入当地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与盛子瑾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1939年2月，江上青等决定派朱伯庸到中共山东分局汇报工作，请求派干部进入皖东北，扩大与加强皖东北党的领导力量。3月，山东分局派杨纯秘密到达国民党第六行政专署所在地管镇，与江上青接上关系，建立中共皖东北特委，杨纯为书记，江上青等为委员。从此，在皖东北的共产党员（包括从大别山、山东、上海等地共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及当地发展的党员），都统一在皖东北特委的领导之下，接受中共山东分局所属苏皖区党委的领导。皖东北特委在原特支工作的基础上，在盛子瑾统辖的武装部队和主要县、区，进一步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又在皖动八团、抗日剧团、

抗演六队等处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这就为皖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盛子瑾和我党在皖东北联合抗日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本地封建势力的反对。国民党灵璧县县长许志远就网罗了一批顽固派地主，对盛明顺暗反。因此，盛子瑾为自身计，也更需要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江上青等同志抓住这个机会，推动盛子瑾写信给在豫皖苏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彭雪枫，派泗县一区区长吕振球（我党秘密党员）前往联系。1939年7月，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刘玉柱以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秘书的身份，携带彭雪枫写给盛子瑾的复信，与盛商谈了合作抗日大计。接着，八路军胡炳云大队很快由宿北、灵北深入到泗北、泗南一带活动，不断打击敌伪，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皖东北的影响，同时也为我军筹集了抗日经费和物资。

到皖东北以后，江上青一直带病坚持工作。1939年8月29日，他随盛子瑾到张大路和许志远谈判结束归来，行至泗县小湾子附近的王圩子，遭到许志远指使的大地主柏逸荪（柏宣生）、王仲涛等反动武装的预谋伏击，江上青不幸饮弹牺牲。时年29岁。

（整理人：袁德梁、武继羽、蒋建）

朱 启 哲

(1919—1940)

启哲，女，1919年出身于涟水朱南荡一个地主家庭。她的哥哥朱启宇是位进步的大学生，1937年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参加八路军；她的堂哥朱启勋于1940年任新四军某部营长，1942年夏在宿迁陆集战斗中牺牲。族中还有其它兄弟姐妹以及子侄辈多人先后参加我党我军。

启哲长得眉清目秀，肤色白里透红。她品学兼优，多才多艺。上县立女子小学和淮阴师范及金陵女大高中班时，门门课程都在九十五分以上。她有副好嗓子，唱起那时进步的流行歌曲如《渔光曲》、《马赛曲》、《毕业歌》等，悦耳动听，富有感染力。老师同学们都夸她为“涟水的歌手”。

到南京上学后，启哲的思想感情起了明显的变化，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成深沉、冷静和善于思考的大人了。她读了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及鲁迅的一些著作后，思想进步很快。常和同学们谈抗日救亡问题。启哲还常常吟诵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抒发她对国事

的忧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南京大中学校纷纷西迁，女学生中，有的主张到大后方继续读书。启哲与我商量，决定回家乡涟水去，坚信总有一天会找到共产党来领导我们抗日的。

1938年春，启哲和她的哥兄们以家乡朱南荡为中心，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就在他们兄妹的影响下，周围一、二十里地的知识青年、农民青年，纷纷参加抗日武装，从事革命工作。1939年5月份，启哲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日夜思念的共产党已经到我家来了，你赶快来吧！”启哲是涟水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了。

启哲在未参加革命前，无论是在学校或是在家里，物质生活都是很丰裕的。而参加了游击队，既无粮也无钱，就靠吃派饭过日子。我们宣传队十八、九个成员中大都是刚刚入伍的知识青年，从未吃过那难以吞咽的饭食。在这方面，启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确实起到了表率作用。不论到哪个村庄，安排吃派饭时，她都是把党员安排到吃豆饼或高粱汤煮山芋的穷人家里，把非党战士安排到有麦仁干饭或有稻头疙瘩的富户人家去。启哲每次总是不声不响到穷户人家去。她常乐呵呵地说：“山芋煮稀糊，尝尝穷人的苦处。”由于她的模范行动，感染了很多党内的同志。

行军中，启哲总是跑前跑后，帮这个背面袋，帮

那个扛背包，爱护和关怀同志。

有一次，在宣传队讨论谁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小姑娘时，大家左顾右盼，都害怕被人说长道短，害怕丢丑。还是启哲自告奋勇承担了任务。启哲为了演好戏，行军时默默地背诵台词，每到一个驻地，就一招一式，反复练习。几天后，在群众的打麦场上，小镗锣一敲，吸引了许多群众。启哲演得很成功，当“父亲”用鞭子抽打“女儿”时，启哲真的流泪了，声音嘶哑了。观众中的老奶奶、大嫂子、小姑娘跟着抽鼻涕，掉下了同情的泪水。戏一收场，一个老年妇女跑过来，拉着启哲的手说：“闺女，你这戏演得真好呀！”接着就你拉我拖地把启哲请到他们家里吃饭。启哲能演会唱，无论行军或宿营，只要环境允许，她就放声高歌，行军途中，她总是到处拉歌，歌声此起彼落，几十里地不觉疲劳就过去了。

1939年10月底，组织上派启哲去皖东北党校学习。启哲依依不舍地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告别后就上路了。

启哲在皖东北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泗县担任妇救会工作。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政治工作队。皖东北形势好转后，她又带队到新区去开展工作。

1940年5月，启哲率工作队到泗县袁圩（今属泗洪县）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袁圩的恶霸地主袁林暗中向泗县的鬼子告了密。28日，大队鬼子在汉奸

王仲涛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袁圩子。启哲当时正在一家农户开会，当她指挥突围时，已经来不及了，鬼子进了家院，启哲和同志们一起落入敌掌。

“你们的大干部在哪里？”鬼子队长凶狠地问。

启哲和同志们昂首挺胸，没有回答。

“你们谁是共产党？”

“不知道！”启哲带头坚定地说。

“枪毙的有！”鬼子队长咆哮起来。

“中国人是不怕死的！”

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就用木棍、皮带毒打他们，启哲和同志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敌人得到的还是有力的痛骂：“你们这班强盗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

启哲和同志们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汉奸王仲涛和鬼子队长咕叽了几句，几个男同志被带走了。只留下启哲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王仲涛对她们说：“这样吧，你们写个自首书，保证今后不干共产党的事，就放了你们，怎么样？”启哲和那个女同志挣扎着站起来，却挥笔分别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残无人性的鬼子用刀把她们的一个手指一个个剁掉，启哲仍是骂不绝口。最后鬼子队长气急败坏地叫道：“枪毙！统统枪毙！”一队鬼子押着启哲和同志们向圩后走去。启哲边走边对战友们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时刻到了，同志们，

我们一起再唱一次歌吧！”于是启哲带头唱起了：“枪口对外，仇敌认清，杀、杀、杀，杀向前走，为国家，为民族，真正值得我们牺牲……”雄壮的歌声还未唱完，敌人的屠刀便砍在启哲和战友们的头上……

启哲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了涟水家乡，家里的亲人痛不欲生，庄邻父老哭泣不已。人们都说七姑娘小小年纪，就为国家做了大事，更多的家乡青年则是在启哲事迹的感动下，参加了我党我军，誓向日寇复仇。

原中共江苏省常委、副省长陈书同曾亲临启哲墓地悼念，他对启哲的评价是：启哲同志是一位为国牺牲的好干部、好党员。她的英勇事迹惊鬼神、动天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张鸿志同志供稿）

陈 飞

(1914—1940)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着天下的兴亡！……”

1937年12月，年刚二十出头的陈飞，告别了上海的寡母、兄妹，同十位战友，一路跋涉，来到了苏北东、灌、沐一带，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

陈飞，原名陈必贵，1914年生于上海市静安区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他自幼好学，七岁进上海和安小学读书，刻苦努力，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正当陈飞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寻求真理的时候，父亲不幸去世了。为了家庭，陈飞不得已休学，用他那弱小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到民国六报社当了徒工学习铸字，繁重的劳动、铅毒的侵蚀、肮脏和潮湿的工作环境，使陈飞身上生满了疮。然而，劳累、贫困、病痛，丝毫没有减弱陈飞求知的欲望。他把书上、报上的知识摘抄下来，有的文章太长，摘抄不便，他就把它剪下来保存。久而久之，这些东西竟装满了两大箱。

不久，灾难又向陈飞袭来。1932年“一·二八”事

件发生了，民国六报社因刊登上海人民声援十九路军反击海军陆战队的文章而被查封，尚未满师的陈飞失业了。生活的困苦引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懑。他一面寻找工作，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过了年把，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和一口熟练的英语，考进了英国人开办的公共汽车公司，当上了售票员。

售票员这个职业，使陈飞有了更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这期间，经常有人来找他，他本人也经常到外面去，还常常用新文字(密码)和其他人联络。他究竟干什么，家里怎么问他也不说。

有一天，他在家里偷偷试做手榴弹，被母亲看见了，母亲惊慌起来，想用成家的办法，拴住陈飞的心。母亲相好了一个姑娘，和陈飞说了。陈飞却摇摇头说：“这哪成？成家，成家，没有国，那有家？现在我们国家被帝国主义糟踏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心思成自己的小家呢？”母亲被他那颗炽烈的爱国心感动了，噙着泪花，点了点头。

1935年冬，陈飞又以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通过考试，到江海关当税警。当时进入海关工作是被视为“铁饭碗”的，好多人羡慕这个职业。然而，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经济的一大关卡。陈飞受着海关洋人的压榨和欺侮、冷遇和歧视，件件不平燃起他心中的怒火，而这时，侵华日军又得寸进尺，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热衷于剿灭共产

党，这更引起了陈飞对时局的不满和关注。

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陈飞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他每天一下班，就同里弄的青年一起，写抗日壁报，演抗日话剧，歌唱救亡歌曲，并和张乃璜等人建立“同人学术研究会”，利用晚上学习进步书刊，后改名为“学习哲学小组”，地点设在“江海关下级同人俱乐部”内，并接受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

1936年冬，陈飞和张乃璜组织江海关一部分税警和税务检查员，开展了当时全国有名的反走私白银出口日本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飞、张乃璜、孟东波等人组织了“江海关下级同人俱乐部战地服务团”，进行了募捐慰问抗日前线将士和战地救护训练等工作。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服务团即赴前线劳军，并做好慰问伤员、救济难民、宣传和组织难民等工作。在这些斗争中，陈飞总是率先参加，起模范作用。

上海沦陷后，陈飞没有苦闷、彷徨。1937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与孟浪（孟东波）、冯国柱、翁默清、叶进夫等十一人组成“国民歌咏救亡协会宣传第二队”，乘轮船离开上海，准备经苏北由陇海路，奔赴抗日圣地——延安。

轮船驶进南通港，陈飞等人登岸后，徒步经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一路以抗日歌曲和自编自演的文